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

——以《海行总载》为中心

徐东日 金禹彤 著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

——以《海行总载》为中心

徐东日 金禹彤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广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以《海行总裁》为中心/徐东日,金禹彤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

ISBN 978-7-01-019015-0

I. ①朝… II. ①徐… ②金… III. ①朝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古代
IV. ①D83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0739 号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形象

CHAOXIAN TONGXINSHI YANZHONG DE RIBEN XINGXIANG

——以《海行总裁》为中心

徐东日 金禹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45 千字

ISBN 978-7-01-019015-0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朝鲜通信使与《海行总裁》	1
第一节 朝鲜通信使	1
第二节 《海行总裁》的版本	9
第二章 朝鲜通信使的日本使行概况	12
第一节 朝鲜通信使的使日过程	12
第二节 朝鲜通信使与日本人的文化交流	25
第三章 朝鲜通信使笔下优美洁净的日本	32
第一节 秀美、壮美的日本自然形胜	32
第二节 洁净、优美的日本的寺院环境	42
第三节 净化、美化自然环境的日本人	46
第四章 朝鲜通信使笔下日本人奇异独特的生活习俗	52
第一节 日本人的服饰礼俗	52
第二节 日本人的婚姻礼俗及两性意识	79
第三节 日本人的丧祭礼俗	102
第五章 朝鲜通信使笔下日本人严谨循序的礼仪	120
第一节 日本人的日常接待礼仪	122
第二节 日本地方官吏的接待宾礼	130
第三节 日本幕府将军的国宾礼	142

第六章 朝鲜通信使笔下繁华的日本城市 161

 第一节 日本城市的发达与物产的丰饶 161

 第二节 日本人工艺水平的高超与科技的发达 176

第七章 朝鲜对日本的社会总体想象与日本形象的塑造 201

 第一节 朝鲜对日本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日本形象的嬗变 202

 第二节 朝鲜通信使的日本体验与日本形象的塑造 211

参考文献 214

附 录 232

后 记 264

第一章 朝鲜通信使与《海行总载》

第一节 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半岛的朝鲜王朝时期,为了改善和促进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朝鲜国王曾多次派遣通信使和问慰使赴日。这里所说的朝鲜通信使,具体而言,是指朝鲜国王为了向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足利、德川幕府)表示慰问或哀悼,或为了解决两国的紧急事项而向日本派遣的正式的外交使节,一般由携带着朝鲜国王的国书和礼单的3名中央官员及其他470—500名成员构成。

通信使的字面意义是“互通信义的使臣”。朝鲜王朝使用的“通信使”一词的概念包含着这样的含义:该外交使节肩负着加强邻国间儒教的信义和礼道并实践交邻理念的使命。因此,通信使基本上排斥追求财物或贸易利润的行为,是在朝日两国关系上,由朝鲜国王派到日本幕府将军的使节。^①不少研究者将朝鲜朝派往日本的使行称为“朝鲜通信使”。但在朝鲜方面的官方史料中,派往日本的使行只被称为“日本通信使”“日本国通信使”,或者简称为“通信使”,还有“丁未通信使”“己亥通信

^① 孙承喆:《朝鲜时代通信使概念的再探讨——探贼使任命大使对日使行的外交意义》,见《2003年朝鲜通信使韩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朝鲜通信使文化工作促进委员会,2003年,第5页。

使”这种加上通信使派遣当年的干支作为名称的。相反,日本则使用日本的年号称作“庆长通信使”或“享保通信使”等。由此看来,现在使用较多的“朝鲜通信使”的术语,其实包含着“来自朝鲜的通信使”之意,可以说是以日本史为中心的术语。因此,“朝鲜通信使”作为指称来往两国的使行而使用的国际学术用语并不恰当。该使行的名称正如当时史料上所确认的一样,如果单纯称之为“通信使”则更加妥当。另外,朝日关系史上出现的问慰使则是朝鲜礼曹参议派到对马岛主处的使臣。^① 就这样,朝鲜向日本的幕府政权派去了通信使,向对马岛派去了问慰使,对此,日本根据《己酉条约》定期派遣年例送使,本该由幕府解决的外交悬案则由对马岛代理解决,重点向朝鲜派遣大差倭。尤其是出现关白或对马岛主的死亡、承袭的事件,得到通信使行或问慰使行的邀请等事宜时,朝鲜就向日本派遣使节,日本将此使节称作别差倭。^② 但后来由于发生了“篡改国书事件”(柳川一件),对马岛的欺骗行为被曝光,幕府随即实行了以酌庵轮番制直接管理对朝外交文书的做法;而朝鲜则本着“远人厚待”的原则,为来自日本的使节设立了倭馆,并在那里接待日本使节,通过倭馆开展通交业务。朝鲜之所以禁止包括日本国王使在内的各种差倭上京,除了军事原因之外,主要就是对日本的外交不那么加以看重(相较于对中国的外交)。

朝鲜国王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的时间横跨整个朝鲜朝,它相当于日本从室町时代直到江户时代。1429年(世宗11年),由正使朴瑞生、副使李艺、信使金克柔组成的朝鲜使团首次以通信使的名义被派往日本。通过这次使行,可以看出朝鲜派遣的通信使都必须具有以下条件:第一,由朝鲜国王向日本国王(幕府将军)派遣使团;第二,以探望日本国王或解决两国的紧急事宜为目的;第三,须携带朝鲜国王给日本国王的国书和礼

① 洪性德:《关于朝鲜后期问慰行》,《韩国学报》59,一志社。

② 洪性德:《十七世纪别差倭的渡来和朝日关系》,《全北史学》15,全北大学校史学会,第109页。

单;第四,使团由3名中央高官及其下属组成;第五,拥有国王使节的称号。^①其先例在高丽王朝(1375年)即有,到了朝鲜王朝的成宗朝(1469—1494年),则确定了使团组成人员的规格及其携带物品的标准,并且从孝宗朝(1649—1659年)开始正式确定下来。朝鲜朝时期主要的赴日行使达77次,其中,日本江户时期的庆长十二年(1607年)到文化八年(1811年)间的使行往来共12次。这12次行使,历来被日韩学者视作日韩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可以说,这是狭义上的通信使。李贤总在1964年出版的《朝鲜前期对日交涉史研究》(韩国研究院)中写道:凡由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臣均称为“通信使”。而孙承喆和三宅英利则认为:朝鲜朝前期向日本共派遣使臣达18次之多,其中以通信使的名义向日本派遣使节达8次(1428年、1439年、1443年、1460年、1475年、1479年、1590年和1596年)。^②但实际上,1460年、1475年和1590年由于正使患病或国难等原因,朝鲜使团并未成行,所以可以说朝鲜前期共向日本派遣5次通信使。“壬辰倭乱”爆发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通信使的往来也随之中断。

“壬辰倭乱”之后,德川幕府实际掌握了日本的政权,于是在德川幕府的一再斡旋之下,朝鲜通信使重新踏上使日路途,结果一度中断的朝日谈判正式开始。由于朝鲜与日本均与对马岛的实利相关联,讲和进展得格外顺利。战争结束仅数年后的1604年(先祖37年),僧人惟政和孙文或就以探贼使的身份经过对马岛前往京都,考察了日本国情;他们拜见了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得到了德川将军的国书和交还盗墓贼的成果,恢复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此后,朝鲜国王于1607年派遣以正使吕祐吉为首

^① 三宅英利:《朝鲜通信使与日本》,金世民译,至诚之泉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② 孙承喆:《朝鲜时代通信使概念的再探讨——探贼使任命大使对日使行的外交意义》,见《2003年朝鲜通信使韩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朝鲜通信使文化工作促进委员会,2003年,第34页。

的一行人作为“回答兼刷还使”前往江户,这是朝鲜后期派遣通信使的新开始。两年后的1609年(光海君1年),朝鲜与日本签订了《己酉条约》,这标志着朝日两国外交开始恢复了正常化;1611年岁遣船的通航,标志着朝日两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①

从1607年开始,朝鲜朝后期共派遣12次通信使。但“壬辰倭乱”之后的1607年、1617年、1624年派遣的使节的正式名称为“回答兼刷还使”。所以在新的外交机制确立前的过渡时期,朝鲜国王派遣到日本的外交使节的正式名称为“回答兼刷还使”。在确定1607年的使节名称的过程中,曾出现了“通谕使”“回答使”“通信使”等众多称谓^②,而最终定名为“回答兼刷还使”则意味着这是为回复请求恢复外交的幕府将军的国书的使节,也是为送还战争时所抓捕的俘虏的使节^③。

就日本而言,恢复外交后的朝鲜通信使活动(1607年、1617年、1624年)即派遣回答兼刷还使,是德川幕府为了彰显其国际影响力、加强对国内诸侯的统治、巩固幕藩体制所采取的政治意图很强且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外交手段。而对朝鲜朝来说,他们将派遣到日本的最初3次通信使改称为“回答兼刷还使”,表明了朝鲜国王期望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索要战争俘虏的强烈意愿。也就是说,当时朝鲜朝以国家的名义所派遣的使节,虽然在性质上与通信使相似,但名字只能是“回答兼刷还使”。此后,朝鲜朝又于1617年和1624年两度派遣与此性质相同的“回答兼刷还使”。

在江户时代12次派遣通信使的过程中,前五次的派遣原因较为复

① 关于“壬辰倭乱”后位恢复外交,两国强化使的往来及交涉过程,孙胜哲在《壬辰倭乱后公平的睦邻政策的复活》(《朝鲜时代朝日关系史研究》,至诚之泉出版社1994年版)中进行了整理叙述。

② 《宣祖实录》39年8月23日(己未),《朝鲜王朝实录》(太白山史库本)点校本,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ian.jsp>。

③ 《宣祖实录》40年1月5日(己巳),《朝鲜王朝实录》(太白山史库本)点校本,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ian.jsp>。

杂,其中有战后修好、俘虏刷还等原因,后七次则主要是为了祝贺幕府将军袭位。这样的使团人数多则近 500 人,少则 200 多人。使团主要组成人员包括:三使(正使、副使、从事官)、堂上译官、上上官、上判事、学士、上官、次官、中官、下官、医员、马才以及其他一些随从人员。另外,“回答兼刷还使”的人员构成及其行程与通信使很相似,据《朝鲜王朝实录》《通信使誊录》《增正交邻志》《通文馆志》等朝鲜官方资料及当时朝鲜使团成员的回忆录表明,当时的人们也认为“回答兼刷还使”和朝鲜朝前期的通信使相同。^① 另一方面,第 2 次及第 3 次朝鲜政府所派遣的“回答兼刷还使”的作用较第 1 次有了明显的弱化,朝鲜朝后期首次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是在 1636 年,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明朝的册封体制已经崩溃、朝日国内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派遣朝鲜通信使是为了适应这些局势变化而采取的外交政策的必然产物。由此看来,朝鲜朝早期所派遣的“回答兼刷还使”与“通信使”在其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一般说到朝鲜通信使,均是在“朝鲜朝后期朝鲜政府向日本派遣使节”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认为朝鲜通信使就是朝鲜朝后期的对日外交使节,将其时间限定在朝鲜朝后期,即日本的江户时代。但如上所述,朝鲜通信使不仅是指朝鲜朝后期所派遣的使节,可以说它是整个朝鲜时期朝鲜国王向日本所派遣的使节。尽管朝鲜朝的通信使是朝鲜国王向日本的足利政权、丰臣政权和德川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所派遣的使者,但日本的研究者却局限于日本历史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变化,只强调了德川政权的近代性特征,这导致产生了上述的误解。日本学术界的这种研究倾向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就对日外交而言,朝鲜朝前后期的朝日关系及外交体制是一致的,从信义角度出发,朝鲜对待邻国的睦邻政策也没有发生改变。当然由

^① 《光海君日记》2 年 3 月 6 日(壬午),14 年 1 月 22 日(戊午),1607 年第 1 次回答兼刷还使的随行文官蒋希春在回忆录《海东记》中自称为“三信使”。

于“壬辰倭乱”，也发生了不少政策上的变化，但总体上讲，朝鲜在同一王朝统治下基本维持了“睦邻友好事关重大”的外交政策，外交体制和对日本的态度也基本保持一致。^① 所以，朝鲜朝前后期的通信使是持续的，将朝鲜朝通信使限定为朝鲜朝后期的对日使节是不合适的。

朝鲜从 1413 年开始，就以通信使的名义向日本派遣了使臣。在朝鲜朝前期一共派遣了 9 次。但由于“壬辰倭乱”的爆发，两国外交关系遭到破坏，通信使的派遣也因此中断。朝鲜国王再次向幕府派遣使节是在 1604 年，这次朝鲜派出的是探贼使。1607 年以后派遣了三次“回答兼刷还使”。从 1636 年开始，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已成为朝鲜的一种惯例，直到 1863 年共有 9 批通信使被派遣到日本。^② 其中，“壬辰倭乱”之后不久的 1604 年，出于侦察日本国情的目的，朝鲜以探贼使的名称派四溟堂出使日本。接着是 1607 年，所派遣的使行正式名称是“回答兼刷还使”，这一名称包含着答复幕府将军并重启国交的含义，以及送还战时被掳人丁的功利性目的，而且由于两国尚未正式开启国家间的外交，所以也就没有使用通信使的名称，而是代之以“回答兼刷还使”的名称。1617 年的使行也沿用了这个名称。不仅如此，1624 年朝鲜派遣到日本的使行也沿用了回答使的名称。不过在朝鲜官方的记录中，将参与这一使行的人们与朝鲜前期的通信使等同看待，因而以上所述的回答兼刷还使和回答使，在性质上与通信使并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可以将它纳入到通信使范畴内加以说明和研究。

不过，朝鲜重新以通信使的名义派出使节是在 1636 年。当时以明朝为中心而贯彻的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已经宣告崩溃，朝鲜和日本的国内情

① 河宇凤：《对朝鲜后期韩日关系的再思考》，《东洋学》27—1（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1997 年。

② 孙承喆：《朝鲜时代通信使概念的再探讨——探贼使任命大使对日使行的外交意义》，见《2003 年朝鲜通信使韩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朝鲜通信使文化工作促进委员会，2003 年，第 21、26 页。

况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朝鲜在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上倾向于摆脱中华的交邻体制,承认日本为“通信之国”,将派遣通信使加以常规化。朝鲜派遣通信使的目的表面上是“祝贺将军袭职”,但实质上却不单纯是为了致贺将军袭职的目的而派出祝贺使,17世纪朝鲜国王派遣通信使附带了比较特殊的政治目的。譬如,1643年所派遣的通信使具有牵制并缓解清朝政治、军事压力的意图,也有侦察兼带考察政治制度和岛源之乱等日本国情的目的;1655年派遣通信使是为了确认日本企图“假道朝鲜”的情报真伪的目的;1682年派出的通信使是为了解决悬案问题,如为控制与对马岛的贸易而制定的7项条款的朝市约定等。另外,到了18世纪,朝鲜和日本的两国关系比以往更加平稳。这一时期的朝鲜通信使的外交变得礼仪化,其文化机能得到强化。

朝鲜朝后期,尤其是1811年以后,朝鲜朝和幕府政权都感觉到朝鲜通信使的作用已经在减弱。首先,对朝鲜朝来说,从一开始使行日本就是一种政治负担与经济负担,因而朝鲜朝开始对赴日使行进行重新审议;而在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业已巩固,朝鲜通信使的来访对提高幕府权威的作用已经不太大,反过来日本还要被迫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为朝日两国中介的对马岛,其经济损失也远大于经济收益。^①加上19世纪中期东亚不断受到了西方势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自1811年朝鲜通信使使行日本之后,朝鲜国王就再也没有派遣通信使到日本。其次,朝鲜国王定期派遣通信使的体制一旦确立,其派遣通信使的目的似乎都变成了“祝贺将军即位”,但实际上,与早期的朝鲜通信使(回答兼刷还使)一样,朝鲜通信使每次都有他们特定的政治目的。例如,1636年和1643年是为了缓解清朝对朝鲜朝的压力而去考察日本的,其中也兼带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以及岛源之乱;1655年,则是为了确认日本“假道朝鲜”的消息

^① 金文植:《朝鲜后期通信使行的对日认识》,《大东文化研究》41,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第122—132页。

是否属实而遣使;1682年,则是为了控制与对马岛的贸易活动以及需要解决7条朝市约定而派遣了通信使。所以直到17世纪末以清朝为中心的东北亚的国际形势重新稳定下来为止,通信使和回答兼刷还使的性质基本相一致,都是一种政治型使节。因此,应该将初期的回答兼刷还使和通信使一并看作是通信使。但进入18世纪后,通信使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解决两国间的外交问题,而更多的是出于礼节上的祝贺将军即位等事宜,因而朝鲜通信使就由政治型使节转变成了文化型使节。

所有的外交行为都意味着两国间的相互关系,朝鲜王朝和日本之间的外交也不例外。但是,国际上有些研究者却无视朝日两国外交关系的这种事实,在阐述朝鲜通信使问题时只是一味地强调朝鲜国王主动地派遣使节到日本幕府的现象,其目的是要让人们觉得在朝日关系上日本占据着相对优越的地位,即,这种叙述态度容易让人误以为只有朝鲜从国家层面派遣使节到日本,而日本却没有从国家层面派使节到朝鲜。

这种叙述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实际上,朝鲜通信使是应日本的邀请而派遣到日本的,费用也是由日本承担的。邀请通信使的理由一是要借此提高幕府将军的权威,二是为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因而,只是一味强调朝鲜派遣通信使这一方面,就会很容易让人们忘记外交关系本来就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的事实。

总而言之,在叙述朝鲜朝后期朝日关系史时,“朝鲜通信使”这一用语使用得很多。但这一用语只是包含着单纯的“朝鲜朝后期—德川幕府时代从朝鲜派遣到日本的使臣”之意。不过,这并不能全部事实说明得十分清楚。因为朝鲜自改朝换代以来,一贯奉行对日的交邻政策,从这种外交政策出发,朝鲜通信使作为朝鲜国王的使节被派遣到日本。再者,朝鲜通信使是从朝日两国双向的外交关系角度指称朝鲜国王使节的,因而在叙述当时的朝日关系时,对日本派遣到朝鲜的使行也应该给予相应的关注。另外,如果将朝鲜派遣到日本的通信使的叙述焦点仅仅限定在“祝贺将军袭职的使节”上也较难阐释清楚。朝鲜派遣通信使时,因为有

侦察日本国情的政治目的,所以无视派遣通信使所具有的文化交流意义是片面的。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只强调朝鲜派遣通信使到日本是为了弘扬朝鲜的文化,同样也是十分片面的。

第二节 《海行总载》的版本

《海行总载》是朝鲜朝使节(通信使)将他们在日本耳闻目睹的事情如实记录下来的纪行作品的总集,据目前收集作品的情况,至少有 37 篇纪行作品^①,但由于各种版本所收录的作品不等,所以基本都少于 37 篇。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悉的“海行总载”作品的最早版本当属尚不知记录年代的朝鲜朝礼曹所编撰的《通信使誊录》。

我们知道确切出版年代的版本,当数 1914 年朝鲜古书刊行会编辑出版的四卷本的《海行总载》。其内部作品如下:第一卷(1. 申叔舟《海东诸国记》,1443 年;2. 金诚一《海槎录》,1589 年;3. 申维瀚《海游录》,1719 年;4. 姜沆《看羊录》,1600 年)。第二卷(1. 庆暹《庆七松海槎录》,1607 年;2. 吴允谦《东槎上日录》,1617 年;3. 李景稷《李石门扶桑录》,1617 年;4. 姜弘重《东槎录》,1624 年;5. 任紬《任参判丙子日本日记》,1636 年;6. 金世濂《海槎录》,1636 年)。第三卷(1. 金世濂《槎上录》,1636 年;2. 黄桱《东槎录》,1636 年;3. 赵綱《东槎录》,1643 年;4. 申濡《海槎录》,1643 年;5. 佚名《癸未东槎日记》,1643 年)。第四卷(1. 洪禹载《东槎录》,1682 年;2. 金指南《东槎日录》,1682 年;3. 赵曦《赵济谷海槎日记》,1763 年)。

其后出版的是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于 1967 年 3 月出版的十一卷本

^① 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5),“附录一:现存朝鲜通信使文献简目”,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16—418 页。

的《海行总载》。其内部作品如下：第一卷（1. 郑梦周《奉使时作》，1377年；2. 申叔舟《海东诸国纪》，1443年；3. 金诚一《海槎录》，1589年；4. 申维瀚《海游录上中》，1719年）。第二卷：（1. 申维瀚《海游录下》，1719年；2. 姜沆《看羊录》，1600年；3. 庆暹《庆七松海槎录》，1607年；4. 吴允谦《东槎上日录》，1617年）。第三卷（1. 李景稷《扶桑录》，1617年；2. 姜弘重《东槎录》，1624年；3. 任统《任参判丙子日本日记》，1636年；4. 李志恒《漂舟录》，未详）。第四卷（1. 金世谦《海槎录》、《槎上录》，1636年；2. 黄桀《东槎录》，1636年）。第五卷（1. 赵曦《东槎录》，1643年；2. 申濡《海槎录》，1643年；3. 佚名《癸未东槎日记》，1643年；4. 南龙翼《扶桑日记》，1655年）。第六卷（1. 南龙翼《闻见别录》，1655年；2. 洪禹载《东槎录》，1682年；3. 金指南《东槎日记》，1682年）。第七卷（赵曦《海槎日记》，1763年）。第八卷（1. 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1420年；2. 黄慎《日本往还日记》，1596年；3. 郑希得《海上录》，1597年）。第九卷（1. 鲁认《锦溪日记》，1599年；2. 任守《东槎日记》，1711年）。第十卷（1. 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1748年；2. 柳相弼《东槎录》，1811年；3. 金绮秀《日东记游》，1876年）。第十一卷（1. 李铤永《日槎集略》，1881年；2. 朴泳孝《使和记略》，1882年；3. 朴戴阳《东槎漫录》，1884年）。

还有，最近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6月出版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其内部作品如下：第一卷（1. 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1420年；2. 申叔舟《海东诸国记》，1443年；3. 黄慎《日本往还日记》，1596年；4. 庆暹《庆七松海槎录》，1607年；5. 李景稷《扶桑录》，1617年）。第二卷（1. 姜弘重《东槎录》，1624年；2. 任统《任参判丙子日本日记》，1636年；3. 佚名《癸未东槎日记》，1643年；4. 南龙翼《扶桑日记》，1655年）。第三卷（1. 洪禹载《东槎录》，1682年；2. 金指南《东槎日记》，1682年；3. 任守幹《东槎日记》，1711年；4. 申维瀚《海游录》，1719年）。第四卷（1. 曹命采《奉使日本时闻见录》，1748年；2. 洪景海《随槎日录》，1748年）。第五卷（1. 赵曦《海槎日记》，1763年；2. 柳相

弼《东槎录》，1811年；3. 金绮秀《日东记游》，1876年）。

除了以上作品集之外，在日本、韩国等国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些单行本。仅仅是韩方对朝鲜王朝（汇总的）相关文件《通信使誊录》及通信使所留下的日记等就有 63 份共 124 件资料。近些年来，日本与韩国的民间团体签署联合申报书，正式以日本江户时代朝鲜王朝向日本派遣的外交使节“朝鲜通信使”的相关资料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申遗资料包括外交文件及绘卷等，日韩合计 111 份共 333 件。

第二章 朝鲜通信使的日本使行概况

第一节 朝鲜通信使的使日过程

一、朝鲜通信使使日的国际背景

14 世纪末,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朝鲜与日本幕府将军以及地方豪族(大内殿、小二殿、一岐岛主、对马岛主等)之间频繁地互派使团。基于对等的交邻立场,朝鲜曾先后 18 次向日本派去了通信使、回礼使、报聘使等使节,而幕府将军也向朝鲜派出 70 多次的日本国王使。这种使节间的频繁来往,使朝日两国间保持了友好关系。

在中国,1368 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太祖朱元璋和永乐帝成祖在其统治时期,基于儒家理念,确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朝贡制度。于是,1367 年,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很快派使臣入明。1371 年,日本、高棉、泰国等国也相继派使臣入明,从而在东亚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1369 年之后,明太祖曾经 3 次派使臣到日本九州征西府怀良亲王处敦促他们朝贡,以便抑制倭寇对中国沿岸的掠夺和骚乱。这时,日方虽然派遣使臣入明,但最终未能阻止倭寇的入侵。于是 1380 年,明太祖给足利义满下诏书,严厉责备倭寇的骚乱和日本使臣的无礼,随后就断绝了与